

江西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潜力研究

——基于面板数据的引力模型实证分析^{*1}

杨伊 高彪 张双

(南昌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江西南昌 330031)

【摘要】:文章采用2005-2016年间面板数据,分析了江西与“一带一路”沿线17个国家双边贸易潜力,并运用贸易引力模型对江西与“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贸易潜力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国家或地区GDP与双边贸易流量成正比,而空间距离与双边贸易流量成反比;与我国陆地接壤的国家对双边贸易流量存在正向影响;APEC成员国对双边贸易流量有正影响;不同沿线国家与江西贸易潜力不尽相同,潜力释放空间各异。在此基础上,就与不同沿线国家如何进一步开展合作,以便更大程度地提升双边贸易潜力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一带一路”;贸易引力模型;贸易潜力

【中图分类号】:F114.4;F2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5097(2018)05-0049-07

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近年来,江西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活动越来越活跃,双边贸易额持续扩大。今年初,欧盟超越东盟、美国,成为江西第一大贸易伙伴和第一大出口市场,而这些欧盟和东盟国家几乎都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显然,双方贸易额持续扩大的背后是贸易政策的选择和制定,那么如何因地制宜,选择和制定区别性的贸易政策,以发掘双边贸易潜力,扩大贸易额,这不仅是当政者面临的问题,更是学术界需探讨的课题。基于此,本文引入国际贸易中的“引力模型”,重点探讨了江西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潜力,以扩大和提升“贸易潜力”为目标,提出了扩大双方贸易额的相关政策建议。

早期关于“一带一路”的研究大多从理论方面展开的。黄河从公共产品理论出发阐述了“一带一路”,他认为“一带一路”倡议的重点环节是促进区域及区域间合作,因而需要有关国家合作提供公共产品^[1]。杜德斌等从地缘政治角度论述了“一带一路”倡议,他们认为“一带一路”为21世纪中国国家大战略指明了地理方向,是中国在新的地理历史条件下融入欧亚大陆的第一次尝试^[2]。杨保军等从空间格局解析了“一带一路”,他认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是我国空间开发格局从单向开放向全面开放、从海陆分割到海陆统筹、从中心聚集到门户引领的总体策略转型^[3]。李丹从全球经贸格局出发,对“一带一路”倡议做了新的阐述,认为中国及其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具有引领和推动全球经贸格局重构的能力,将从全球贸易投资格局、亚洲产业分工体系、全球治理模式等方面对全球经贸格局进行重构^[4]。金玲认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实质是国际公共品供给,而国际公共品供给自然会引出对外贸易^[5]。学者们对“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的对外贸易也展开了大量研究。蛀牙表现在理论和实证两方面。理论方面,王敏研究了“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与国际金融支持,他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过程中,中国的

¹ 收稿日期:2017-09-1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3CJY117);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JJ1546)

作者简介:杨伊(1979-),女,江西樟树人,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金融财税理论与政策;高彪(1990-),男,甘肃庆阳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金融财税理论与政策;张双(1993-),女,河北唐山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财税理论与政策。

对外贸易和对外投资都要随之发生改变^[6]。董红等研究了“一带一路”倡议下我国对外贸易格局变化。他认为“一带一路”倡议从政策、交通、金融等三方面推动我国对外贸易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我国企业开始更加频繁而深入地参与国际贸易竞争与合作，对外贸易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也日益增强^[7]。段铸晟研究了“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和埃及的经贸合作，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找到的一条新的对外贸易合作之路，为中国西线开放和亚欧非合作指明了方向^[8]。林毅夫研究认为，自贸区政策和“一带一路”的倡议，是我国在这个发展阶段，根据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与时俱进提出的新的改革开放战略。“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将会带来一种全新的国际和平、发展、共赢的新秩序、新格局^[9]。张生玲分析了“一带一路”倡议下我国能源贸易状况和展望，提出“一带一路”倡议能够培育对外贸易新增长点，加强能源贸易开发合作，实现中国的强国梦^[10]。实证研究文献相对较多，叶修群利用1993-2013年28省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自贸区的贸易效应，发现我国东、中西部自贸区的贸易效应不尽相同，认为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发展自贸区应依据各自的特色和优势^[11]。孔庆峰采用拓展的“引力模型”，对“一带一路”沿线69个亚欧国家的贸易便利化水平进行测算，发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贸易潜力巨大，地区之间的贸易潜力要大于同一地区国家之间的贸易潜力^[12]。韩永辉等通过测算“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中国与西亚的出口相似度指数、贸易结合度指数、格鲁贝尔-劳埃德产业内贸易指数、布雷哈特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和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分析了中国与西亚地区贸易合作的竞争性和互补性。发现中国与西亚贸易的竞争性比较弱，认为中国可充分利用与西亚贸易的互补性和“一带一路”等有利因素，加强两地贸易合作^[13]。孙金彦等利用时不变和时变衰减随机前沿引力模型估计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53个国家的出口贸易效率与总贸易效率，发现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贸易效率和总贸易效率均呈随时间递增的变化趋势，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具有较大的出口贸易潜力^[14]。孙瑾等计算了1994-2013年“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与中国的双边贸易成本，并对影响双边贸易成本的诸多因素进行面板回归分析，发现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14国的双边贸易成本在二十年来总体呈下降趋势，贸易伙伴与中国的实际GDP差额、两国地理距离与贸易成本正相关，而贸易伙伴的贸易开放度、贸易互补性与贸易成本负相关^[15]。陈虹运用CGE模型构建社会核算矩阵，模拟了不同自由贸易情境。发现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建成自由贸易区后，各参与国的GDP增长率、进出口总额均将有不同程度提高^[16]。张会清运用贸易强度指数模型，从进口贸易和出口贸易两方面分析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联系问题，发现2012年以来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出口贸易取得较大进展，但进口贸易进展缓慢，并提出一些针对性的政策建议^[17]。谭晶荣等运用贸易引力模型对中国与中亚五国主要农产品贸易潜力进行了实证分析，并提出了提升双边农产品贸易的潜力提出了相关建议^[18]。梁琦等利用拓展的贸易引力模型对“一带一路”沿线39个国家的2005-2013年贸易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发现地理距离与贸易壁垒是影响双边贸易的重要因素^[19]。许家云等通过引入传统的制度与贸易关系分析框架，运用空间面板模型深入考察了制度距离、相邻效应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双边贸易的影响，发现中国与沿线国家的相邻效应表现为竞争关系，且无论是针对进口贸易还是出口贸易而言，中国与沿线国家之间的制度距离均强化了相邻效应的“竞争”作用^[20]。

从上述文献可以看出，学者们对“一带一路”的研究主要是从理论阐述、和实证检验两个维度入手，都具有极高的借鉴意义，特别是对“一带一路”背景下如何发展和扩大对外贸易更是展开的深入研究，但是现有文献大多是研究全国性对外贸易，研究区域性对外贸易的文献还相对较少。特别是对江西这个与“一带一路”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的中部大省的研究，尤其是扩大对外贸易、实现收汇、创汇的研究更是非常少。江西自古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发源地，参与海上丝绸之路贸易已有上千年历史。当下又属“一带一路”沿线重要省份，因此研究江西在国家“一带一路”背景下的对外贸易不仅能填补现有研究空白，更能通过研究深入挖掘江西与沿线国家贸易潜力，扩大双方贸易流量，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继续向前发展。

二、模型构建

(一) 引力模型

“引力模型”是由丁伯根(1962)和波伊豪宁(1963)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研究国际贸易问题的比较简单的经济学模型。它的基本形式可以表示如下：

$$P_{ij} = \frac{M(G_i G_j)}{E_{ij}}$$

其中， P_{ij} 表示一国的出口额， G_i 、和 G_j 、分别表示两贸易国 i 和 j 的 GDP， E_{ij} 、表示两个贸易国家的运输距离，通常用两国国家首都(府)的运输距离来表示。

此后经济学家们对上述“引力模型”进行了扩展，形成了较为复杂的新模型：

$$N_{ij} = \alpha_0 (G_i G_j)^{\alpha_1} (PDY_i PDY_j)^{\alpha_2} E_{ij} \gamma_{ij}$$

其中， N_{ij} 表示两国贸易额， G_i 、 G_j 分别表示两国的 GDP， PDY_i 、 PDY_j 分别表示国的人均 GNP， E_{ij} 表示两国间的运输距离， γ_{ij} 代表随机干扰项。

对上式取自然对数得到：

$$\ln N_{ij} = \ln \alpha_0 + \alpha_1 \ln (G_i G_j) + \alpha_2 \ln (PDY_i PDY_j) + \alpha_3 \ln E_{ij} + \gamma_{ij}$$

为准确测算我国与“一代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情况，本文构建 3 个引力模型。

第一个模型如下：

$$\ln N_{ij} = \ln \alpha_0 + \alpha_1 \ln (G_i G_j) + \alpha_2 \ln (PDY_i PDY_j) + \alpha_3 \ln E_{ij} + \gamma_{ij}$$

其中， N_{ij} 是被解释变量表示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进出口贸易总额，解释变量 G_i 、 G_j 、 PDY_i 、 PDY_j 和 E_{ij} 分别表示两贸易国 GDP、人均 GDP 和两国首都(府)间的运输距离。

在第二个模型中，引入两贸易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之差 IIT_{ij} 和边境效应 BDI_{ij} 两个虚拟变量，模型可表示为：

$$\ln N_{ij} = \ln \alpha_0 + \alpha_1 \ln (G_i G_j) + \alpha_2 \ln (PDY_i PDY_j) + \alpha_3 \ln E_{ij} + IIT_{ij} + BDI_{ij} + \gamma_{ij}$$

在第三个模型中，加入中国对“一代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额 $OFDI_{ij}$ 和跨太平洋战略合作伙伴(APEC)两个解释变量，模型如下：

$$\ln N_{ij} = \ln \alpha_0 + \alpha_1 \ln(G_i G_j) + \alpha_2 \ln(PDY_i PDY_j) + \alpha_3 \ln E_{ij} + \alpha_4 \text{LNIT}_{ij} + \alpha_5 \text{BD}_{ij} + \alpha_6 \ln \text{OFDI}_{ij} + \alpha_7 (\text{APEC})_{ij} + \gamma_{ij}$$

(二) 变量与数据处理

1. 变量处理

本文设立三个模型中，共引入变量 7 个。其中，引入三个外生虚拟变量：即两贸易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之差 IIT_{ij} 和边境效应 BD_{ij} 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APEC)，变量具体含义见表 1 所列。

表 1 解释变量说明表

解释变量	具体含义	预期符号	理论解释
G_i 、 G_j	两贸易国 i、j 名义 GDP (美元)	+	代表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进/出口供给和需求能力，通常经济规模与出潜在出/进口能力和贸易流量成正比
PDY_i 、 PDY_j	进出口国 i、j 的人均 GNP	+	代表进出口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反映出该国的进出口能力，通常与双边贸易流成正相关
E_{ii}	两国首都(府)直线运输距离	-	代表了两贸易国之间的运输成本，与两国贸易流负相关
BD_{ii}	虚拟变量，如两国陆地接壤，则取 1，否则取 0	+	代表了两国贸易便利程度，如接壤，则有利于提高两国贸易量
IIT_{ii}	两贸易国人均 GDP 离差绝对值	-	差值越小，表明两国家发展水平相似，居民消费结构趋同，两国贸易更紧密
OFDI	对外直接投资额	+	数值越大，表明两国贸易活动更频繁，有利于增加双边贸易额
APEC	亚太经合组织(虚拟变量，当两国属于亚太经合组织成员国时取 1，否则取 0)	+	在 APEC 框架内，双边贸易便利化程度更高，对推动两国贸易活动健康发展有明显正效应

2. 数据处理

本文选取欧盟成员国中与江西贸易额最大的 7 个国家、东盟 8 国和东北亚日、韩 2 国总共 16 个国家为样本。江西与欧盟 7 国、东盟 8 国和日、韩的贸易数据均来自《江西省统计年鉴》，上述国家 GDP 和人均 GDP 数据来自联合国统计数据库，两国首都(府)直线距离测算来源于 City Distance Tool 计算，对外直接投资来源于《中国对外投资公报》。所有贸易金额均按照当年汇率折算成美元计算。

三、实证过程

本文采用 Stata14.0 软件对江西省 2005-2016 年 12 年间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进行面板数据回归，由于同一国家不同年份之间扰动项可能存在自相关，而默认的普通标准误计算方法假设随机扰动项是独立同分布的，因而造成用普通标准误做回归时估计不够准确。且本文所用数据属于短面板，故采用聚类稳健标准误进行回归分析。首先对各变量取自然对数以有效控制异方差问题，其次，分别对三个引力模型进行混合 OLS 回归，然后对上述三个引力模型再进行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分析，最后利用 LM 统计量对混合效应和随机效应进行检验，结果拒绝了使用混合效应的原假设，利用 Hausman 检验又拒绝了使用随机效应的原假设，故本文最终采用固定效应模型。

(一) 实证检验

做回归前首先对各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 2 所列。

表 2 变量描述性统计(2005 -2016 年)

Variable	Obs	Mean	Std. Dev	Min	Max
E(y)	176	171 430.9	374 197.9	1 450	2 867 570
G(x ₁)	176	2.02e+12	374 197.9	5.76e+10	1.51e+13
PDY(x ₂)	176	22 586.87	18 777.98	684.449 5	56 053.84
OFDI(x ₃)	176	59 519.69	127 327.1	-72 168	1 045 248
E(x ₄)	176	5 433.161	1 7591.3	-81.447 3	50 348.81
HT(x ₅)	176	19 765.97	3 462.938	1 322.28	12 408.13

从自变量和因变量相关系数可看出，IIT 与双边贸易额相关性较差(只有 0.0526)，可认为 IIT 对双边贸易额影响甚微，剔除该变量，将其影响归入到随机扰动项。自变量之间，人均 GDP 和 GDP 之间相关性又较高(0.7020)，剔除自变量人均 GDP，最终变量剩余三个。加入 OFDI 后，模型二和模型三的拟合优度明显下降，且其回归系数不显著，分析原因可能是由于 OFDI 和虚拟变量 APEC 之间存在多重共线性，因中国对直接外投资主要流向 APEC 成员国，故再剔除 OFDI 变量，最终剩余变量四个，分别是国内生产总值(G)、地区中心城市的距离(E)、虚拟变量 BD 和 APEC。

1. 混合 OLS 回归

分别对上述三个引力模型做混合 OLS 回归，结果见表 3 所列。

表 3 三种引力模型面板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InX ₁	1.657 426 *** (0.062 938 9)	1.674 759 *** (0.059 747 7)	1.450 378 *** (0.080 171 6)
InX ₄	-0.186 292 8** (0.711 47)	-0.101 122 5*** (0.068 705)	-0.308 324 9 *** (0.0791109) **
BD		1.009 909 (0.292 441 8)	0.551 228 2*** (0.286 073 4)
APEC			1.067 861 *** (0.295 913 9)
C	-9.095 387 (0.794 307 5)	-10.285 32 *** (0.758 3261)	-10.285 32 *** (0.758 3261)
F?-squared	0.660 7	0.666 6	0.740 1
F	355.75***	278.62 ***	165.09***

注：*、**、***分别表示在10%、5%、1%的情况下拒绝原假设；括弧内数字为稳健性标准误。

2. 固定效应分析

在混合 OLS 回归基础上，考虑到每个国家的国情不同，可能存在不随时间而变的遗漏变量，故考虑使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分析。其 Stata 运行结果见表 4 所列。

表 4 固定效应回归结果

var	固定效应		随机效应	
	Coef .	t	Coef .	t
lnx1	0. 482 115	1. 96	0. 450 511	2. 40
lnx4	0. 217 682	0. 89	0. 404 693	2. 67
BD	0. 730 000	2. 59	0. 593 088	0. 76
APEC	0. 694 000	2. 54	1. 122 824	2. 27
_cons	-16. 515 340	-7. 96	-6. 066 035	-1. 32

3. 随机效应分析

由于随机效应模型认为误差项和解释变量不相关，而固定效应模型认为误差项和解释变量是相关。随机效应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比较，相当于把固定效应模型中的截距项看成两个随机变量，估计时能够节省自由度。因此，再对上述模型进行随机效应估计，结果见表 4 所列。

4. Hausman 检验

对上述随机效应和固定效应进行 Hausman 检验，以确定哪个模型更有效。检验结果表明:P 值为 0.000，故可强烈拒绝随机效应的原假设，采用固定效应进行分析。

(二) 回归结果分析

从上述固定效应回归结果可看出,各解释变量符号和预期符号基本相同,除了剔除原先设定的人均 GDP 和对外直接投资 (OFDI) 两变量外,其他解释变量回归系数均显著,模型组间拟合优度为 87%,整体拟合优度也达到了 82%,F 统计量通过了检验,说明整个模型回归良好,解释力较强。具体看来:

(1) 在 0.05 置信水平下,江西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GDP 与双边贸易额显著正相关。这表明江西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额的增加跟双方 GDP 增加息息相关,GDP 的增加是拉动双方贸易额增加的主要原因。正如模型显示,双方 GDP 每增加一个百分点,能使双边贸易额增加 0.48 个百分点。

(2) 在 0.05 置信水平下,双边贸易额同双方空间距离显著负相关。这说明空间距离可能增加了双方的贸易成本,导致双方贸易额下降。如模型显示,双方空间距离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引起双边贸易额下降 0.2 个百分点。

(3) 是否陆地接壤显著影响双边贸易额。虚拟变量 BD 的回归系数表明,在 0.05 置信水平下,双方是否接壤与双边贸易额明显正相关,具体说来,双方陆地接壤能使双边贸易额增加 0.73 个百分点。但这里的接壤是指同中国接壤,而非同江西接壤。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双方接壤能优化双方通关便利条件,提高双边贸易效率。

是否是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成员国显著影响双边贸易额。虚拟变量 APEC 回归系数表明,在 0.05 置信水平下,如果“沿线”国家属 APEC 成员国,那么双边贸易额将增加 0.69 个百分点。这主要是因为双方同属某一经济组织可能由于签订双方自贸协定等使得双边贸易更加通畅。

四、贸易潜力分析

(一) 贸易潜力分类

贸易潜力是双边贸易额实际值与理论值的比率,衡量的是双边实际贸易额与理论值的差距。根据刘峰和江书关于贸易潜力的分类,如该比率大于 1.2,则属于“贸易再造型”,即双方当前贸易增加的空间相当有限,必须寻求新的贸易条件来拓展和增加双边贸易。如该比率大于 0.8 而小于 1.2,则称之为“贸易开拓型”,即双边贸易还未达到理论峰值,还有拓展空间。如该比率小于 0.8,则称之为“潜力巨大型”,说明双边贸易可拓展的空间巨大,稍做政策调整就可大幅提高双边贸易额。基于此,本文根据上节构建的贸易引力模型,将江西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实际值代入模型获得估计值,然后将实际值与估计值作比获得贸易潜力值,根据该值来分析江西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潜力。具体情况见表 5 所列。

表 5 2005 -2016 年间江西与“一带一路”贸易潜力

年份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均值
英国	0.47	0.48	0.47	0.51	0.51	0.51	0.53	0.53	0.54	0.63	0.62	0.63	0.54
德国	0.63	0.54	0.59	0.61	0.63	0.65	0.62	0.61	0.61	0.70	0.64	0.65	0.63
法国	0.41	0.41	0.42	0.44	0.46	0.47	0.48	0.47	0.48	0.56	0.55	0.55	0.48
西班牙	0.63	0.66	0.75	0.76	0.70	0.76	0.78	0.80	0.83	0.91	0.87	0.88	0.75
俄罗斯	0.69	0.75	0.76	0.78	0.75	0.76	0.77	0.80	0.80	0.95	0.93	0.94	0.86
意大利	0.53	0.54	0.59	0.63	0.62	0.70	0.67	0.64	0.64	0.74	0.73	0.75	0.96
新加坡	0.91	0.80	0.41	0.59	0.56	1.24	0.63	0.91	0.97	1.62	0.95	0.97	0.81
马来西亚	0.30	0.33	0.53	0.57	1.26	1.64	1.61	1.27	1.61	1.21	0.88	0.90	0.98
印尼	0.72	0.88	0.95	1.05	1.70	1.71	1.62	1.63	1.51	1.50	1.67	1.60	1.38
泰国	0.60	1.17	1.52	0.47	0.33	0.72	0.66	0.63	0.60	0.69	0.75	0.78	0.73
菲律宾	1.41	1.87	1.51	1.44	1.45	1.41	1.81	1.60	0.84	1.62	1.43	1.50	1.49
越南	0.77	0.93	1.06	1.19	1.19	1.48	1.56	1.72	1.60	1.57	1.49	1.52	1.34
巴基斯坦	0.95	0.58	0.42	0.99	1.24	1.23	1.50	1.06	1.08	1.21	1.30	—	1.00
印度	0.82	0.87	0.81	0.80	0.79	0.78	0.74	0.74	0.75	0.83	0.78	0.80	0.98
日本	0.46	0.60	0.46	0.48	0.47	0.47	0.50	0.48	0.47	0.55	0.55	0.62	0.51
韩国	0.85	0.82	0.89	0.93	0.86	0.85	0.83	0.81	0.83	0.97	0.96	0.82	0.82

由表 6 可知，从截面个体来看，江西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潜力变化较大。为更清晰得比较该贸易潜力，我们将上述 17 个国家分为三大类：一类是欧盟国家；一类是东南亚国家；另一类是东北亚。数据显示江西对欧盟国家的贸易潜力较高，近十年的贸易潜力值处在 0.41~0.95 之间，均值也只有 0.83 属于“贸易开拓型”。分国家看，只有对意大利的贸易潜力均值大于 0.8，达到 0.98，属于贸易“开拓型”外，其他四个国家均属于“贸易在造型”。相比而言，江西对东南亚国家的贸易潜力总体不高，其近十年贸易潜力值处于 0.41~1.81 之间，均值也达到 1.06，属于“贸易开拓型”，但相比欧盟国家，该值越小，说明其贸易潜力不及前者。分国家看，东南亚 8 个国家贸易潜力均值均在 0.8~1.2 之间，即全属于“贸易开拓型”。具体来看，马来西亚和巴基斯坦贸易潜力平均来说属于“贸易拓展型”、印尼、菲律宾和越南贸易潜力均值大于 1.2，属于“贸易再造型”；只有泰国和印度贸易潜力均值小于 0.8，属于“贸易潜力巨大型”。江西对东北亚的贸易潜力相对较高，贸易潜力值处于 0.33~0.97 之间，其均值为 0.57，远小于 0.8，说明江西对东北亚国家属于“潜力巨大型”。分国家来看，江西对日本贸易潜力较大，属于“潜力巨大型”，韩国则为“贸易开拓型”。具体见表 6 所列。

表 6 江西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潜力类型一

项目	欧盟国家						东南亚国家							东北亚和美国			
类型	贸易开拓型						贸易开拓型							潜力巨大型			
国家	英国	德国	法国	西班牙	斯	意大利	新加坡	马来西亚	印尼	泰国	菲律宾	越南	巴基	印度	日本	韩国	美国
类型	潜力巨大	潜力巨大	潜力巨大	潜力巨大	潜力巨大	贸易开拓	贸易开拓	贸易开拓	贸易再造	潜力巨大	贸易再造	贸易再造	贸易开拓	潜力巨大	潜力巨大	开拓	潜力巨大

(二)贸易潜力再分类

从截面个体的时间序列来看，序列波动幅度也不尽相同。总的来看，存在三种情况，一是属于“潜力巨大型”的国家时间序列表现出平稳增长，说明双方贸易政策制定较好，本文称之为“平稳增长型”，这类国家主要有英国、法国、西班牙、俄罗斯和日本。第二种情况是属于“贸易拓展型”的国家的的时间序列表现出平稳增长，说明双方贸易政策调整较好，剔除了贸易障碍，使双方贸易更加通畅。本文称之为“调整增长型”。这类国家主要有意大利。第三类情况是属于“贸易再造型”的国家时间序列表现出恶化趋势，即本身处于贸易再造状态，但政府政策仍不做调整，贸易潜力越来越低，这也反映出政府工作不到位，本文称之为“贸易倒退型”。这类国家主要有印尼、越南和巴基斯坦。其他情况是上述三种情况的对立面，即属于上述三种类型的国家时间序列表现出原地踏步，或波动很小，这说明政府不重视政策调整，本文称之为“贸易忽略型”。这类国家主要有德国、新加坡、菲律宾、美国。具体见表 7 所列。

表 7 江西与“一带一路”沿线部分国家贸易潜力类型二

所属类型	平稳增长型	调整增长型	贸易倒退型	贸易忽略型
国家	英国、法国、西班牙、俄罗斯、泰国和日本	意大利、马来西亚	印尼、越南和巴基斯坦	德国、新加坡、菲律宾、美国、韩国、印度

针对上述对贸易潜力的划分，我们从每类选出一个国家作为代表，做出其与江西 2005-2016 年间的时间序列图如图 1 所示。该图清晰地显示，以俄罗斯为典型代表的“平稳增长”型国家的贸易潜力系数平稳上升，说明其贸易障碍越来越小，贸易潜力越来越大，政府应当继续保持这种贸易态势，不断增加双方贸易额。以马来西亚为代表的“调整增长型”国家，一开始贸易潜力系数较高，且呈上升趋势，说明贸易障碍逐渐凸显，较高的贸易潜力系数阻碍了贸易额的增加。但随后几年，贸易潜力系数不断下降，表明政府做了相应的工作，且效果显著，使贸易障碍逐渐破解，贸易潜力逐渐释放。以印度尼西亚为代表的“贸易倒退型”国家，近十年一直保持贸易潜力系数稳步上涨，说明其与江西的贸易障碍逐年递增，而政府可能做了相应工作，但效果甚微，使得双方贸易额和理论值差距较大，贸易势头逐年恶化。以德国为代表的“贸易忽略型”国家，从统计初期到统计末了，贸易潜力系数较为稳定，或是波动极小，说明政府至少在统计期内(2005-2016)对此现象不够重视，如果采取更好的措施，可以使双方贸易额提升更多，贸易潜力获得更大释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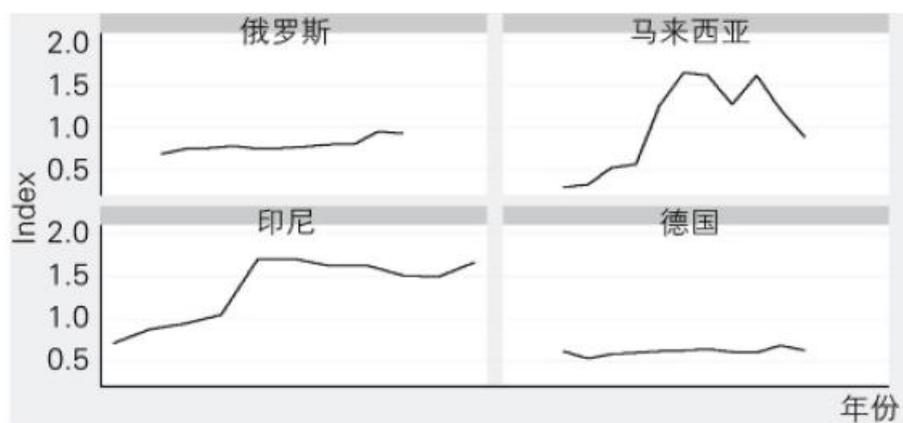


图 1 2005 -2016 年间江西与“一带一路”沿线四个国家贸易潜力时间序列

注：贸易潜力和贸易潜力系数呈反方向变动；贸易潜力系数是实际值对理论值的比值，因而是一个相对量，实际量的增加并不意味着贸易状况的绝对改善。

五、结论与对策

经过上述分析主要得出以下结论：国家或地区 GDP 与双边贸易流量成正比，而空间距离与双边贸易流量成反比；与我国陆地接壤的国家对双边贸易流量存在正向影响；APEC 成员国对双边贸易流量有正影响；不同沿线国家与江西贸易潜力不尽相同，潜

力释放空间各异。

为进一步释放江西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潜力，本文拟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抢抓“一带一路”机遇，谋篇布局江西对外贸易新蓝图。由模型分析结果可知，江西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对外贸易应划分层次、区别对待。江西应优先选择经济体量大、GDP 较高、空间距离较近的国家 and 地区做为贸易伙伴。GDP 主要衡量了一个国家的经济规模，GDP 高的国家，国内需求和供给更旺盛，经济更强劲。空间距离主要影响了双方的贸易成本，距离较近的国家 and 地区不仅可节省贸易成本，其境内市场、文化、居民的消费偏好可能更趋同，因而双方面临的需求更大，有利于双方扩大贸易流量。

(2)紧紧依托“亚太经合组织(APEC)”平台，寻求“一带一路”对外贸易新突破点。亚太经合组织(下文称 APEC)是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相关国家成立的一个旨在促进成员国间经济的相互依存、加强开放的多边贸易体制、减少区域贸易和投资壁垒，促进区域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的经济组织。显然，受益于组织内贸易优惠条款，该组织成员国之间的贸易成本更低、效率更高。而且，该组织成员国同江西空间距离又相对较近，时空优势明显。

(3)继续保持对贸易“平稳增长型”和“调整增长型”国家的政策支持力度。贸易“平稳增长型”国家是对属于“潜力巨大型”国家时间序列表现出平稳增长的统称，它反映了双方贸易政策的适当性，对这类国家应当继续稳健的贸易政策。主要包括的国家有：英国、法国、西班牙、俄罗斯、泰国和日本。贸易“调整增长型”国家是对属于“贸易拓展型”的国家的时间序列表现出平稳增长的国家的统称，它反映了当前政策调整较为恰当。对这类国家应当继续调整型的贸易政策，主要包括：意大利、马来西亚。

(4)加强对“贸易倒退型”和“贸易忽略型”国家的政策调控力度，使之向“调整增长型”和“平稳增长型”靠拢。“贸易倒退型”国家主要是对“贸易再造型”的国家时间序列表现出恶化趋势的国家的统称，该贸易类型反映了贸易国本身处于贸易再造状态，但政府政策调整不到位，致使贸易潜力越来越低，这类国家主要有：印尼、越南和巴基斯坦。“贸易忽略型”则指贸易国的时间序列表现出原地踏步，或波动很小，反映出政府不重视政策调整，听之任之。这两类国家主要有：德国、新加坡、菲律宾、韩国、印度。政府应采取积极有效的政策加以扶持和调控，不断激发其贸易潜能，以增加双方贸易额。

参考文献：

- [1] 黄河. 公共产品视角下的“一带一路”[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5(6):138-155, 160.
- [2] 杜德斌, 马亚华. “一带一路”:中华民族复兴的地缘大战略[J]. 地理研究, 2015(6):1005-1014.
- [3] 杨保军, 陈怡星, 吕晓蓓, 等. “一带一路”战略的空间响应[J]. 城市规划学刊, 2015(2):6-23.
- [4] 李丹, 崔日明. “一带一路”战略与全球经贸格局重构[J]. 经济学家, 2015(8):62-70.
- [5] 金玲. “一带一路”:中国的马歇尔计划? [J]. 国际问题研究, 2015(1):88-99.
- [6] 王敏, 柴青山, 王勇, 等. “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与国际金融支持战略构想[J]. 国际贸易, 2015(4):35-44.
- [7] 董红, 林慧慧. “一带一路”战略下我国对外贸易格局变化及贸易摩擦防范[J]. 中国流通经济, 2015(5):119-124.

-
- [8] 段铸晟. “一带一路”战略视角下的中国—埃及经贸合作研究 [J]. 经济问题探索, 2015(6):92-96.
- [9] 林毅夫. 一带一路与自贸区:中国新的对外开放倡议与举措 [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1):11-13.
- [10] 张生玲, 魏晓博, 张晶杰. “一带一路”战略下中国能源贸易与合作展望 [J]. 国际贸易, 2015(8):11-14+37.
- [11] 叶修群. “一带一路”战略下我国自由贸易园区的贸易效应研究 [J]. 广东财经大学学报, 2016(2):25-32.
- [12] 孔庆峰, 董虹蔚. “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便利化水平测算与贸易潜力研究 [J]. 国际贸易问题, 2015(12):158-168.
- [13] 韩永辉, 罗晓斐, 邹建华. 中国与西亚地区贸易合作的竞争性和互补性研究——以“一带一路”战略为背景 [J]. 世界经济研究, 2015(3):89-98, 129.
- [14] 孙金彦, 刘海云. “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中国贸易潜力的实证研究 [J]. 当代财经, 2016(6):99-106.
- [15] 孙瑾, 杨英俊. 中国与“一带一路”主要国家贸易成本的测度与影响因素研究 [J]. 国际贸易问题, 2016(5):94-103.
- [16] 陈虹, 杨成玉. “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国际经济效应研究——基于 CGE 模型的分析 [J]. 国际贸易问题, 2015(10):4-13.
- [17] 张会清, 唐海燕.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贸易联系问题研究——基于贸易强度指数模型的分析 [J]. 国际经贸探索, 2017(3):27-40.
- [18] 谭晶荣, 王丝丝, 陈生杰.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中亚五国主要农产品贸易潜力研究 [J]. 商业经济与管理, 2016(1):90-96.
- [19] 梁琦, 吴新生.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双边贸易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拓展引力方程的实证检验 [J]. 经济学家, 2016(12):69-77.
- [20] 许家云, 周绍杰, 胡鞍钢. 制度距离、相邻效应与双边贸易——基于“一带一路”国家空间面板模型的实证分析 [J]. 财经研究, 2017(1):75-85.